

延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边区各级工会干部团结带领边区工人群众,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谱写了中国工运史的光辉篇章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领导解放区和全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和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延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完整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造就了一大批革命的领导人才;积累了“局部执政”的经验;培养了伟大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也是中国工人运动从理论到实践逐步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和重大转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各级工会组织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和探索,创造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面,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

陕甘宁边区政府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概况

(一)陕甘宁边区是1937年至1950年之间,在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和宁夏东部,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和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直辖行政区,第二次国共内战起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叛乱区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建制撤销,政府解散。

1934年11月,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的西北红军成立了陕甘宁军事委员会和陕甘宁苏维埃政府;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建立了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使陕北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国内和平,团结抗日,1937年2月,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改变苏维埃制度为人民民主制度,将苏区改为特区;1937年9月6日,根据国共合作协议,将陕甘宁特区改为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使这一地区成为国民政府管辖下的一个地方政府,红军也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

边区政府辖23个县,土地面积1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人,首府延安。边区的政权结构为:参议会,最高权力机关;政府,设边区、县、乡三级;边区高等法院。是三者统一的一元化的民主集中制。

值得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政府的各个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边区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基本都由中共颁布实施。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赋予陕甘宁边区的任务是:进行切实的抗战动员,民主政治建设,文化教育工作的普及,增进国防与民生的经济建设,肃清土匪汉奸,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全国起模范的与推动的作用。

(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10月2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吴起镇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由刘少奇同志负责工会工作,



↑1943年12月,毛泽东、陈云(中)、林伯渠(右)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同年11月,全总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邓振询任副委员长,全总西北执行局下设组织部(部长高长久)、教育部(部长蔡乾)、国家安全部(部长朱学辉)、社会福利部(部长管瑞才)、工部(部长刘群仙)。与此同时,刘少奇同志在瓦窑堡召开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会上修改了工会章程,起草了“工会选举法”,决定把“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1935年7月成立)改为“陕西省总工会委员会”;全总西北执行局和陕西省总工会委员会合署办公。从此,陕甘宁根据地的工人运动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

1937年2月,国共合作,苏区改为特区,全总西北执行局随之改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下设陕北、陕甘、陕甘宁三个省工会,25个县工会。1937年6月,中共中央又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改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临时委员会),主任刘长胜。原下设的省工会改为分区工会。

1938年4月17日至22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正式成立,毛齐华任主任。

从1938年4月到1946年8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共召开过6次执委(扩大)会议;1949年5月1日,由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起,邀请晋东南总工会、晋西北总工



↑一九四三年,毛泽东同志题写“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会、兵工部总工会,在延安召开西北工会代表会议,成立了西北总工会筹委会,5月5日筹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贾拓夫等11人为常委,贾拓夫为西北总工会筹委会主任。至此,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完成其光荣的历史使命。1949年5月,西安解放,西北总工会筹委会于6月中旬从延安迁往西安,边区大批工会干部和职工,随军挺进西南西北,去接收大城市,后来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骨干。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党中央在延安13年;从1925年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到1948年3月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离开延安共23年。在这期间,中国工人运动有过辉煌,有过失落,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底,在长达8年多的时间里,在三次“左”倾错误的领导下,中国工会从大城市到乡村,从白区到苏区,从轰轰烈烈到血雨腥风,直到走上漫漫长征路,历经千山万水,备尝山重水复,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艰难地求索着。长征一结束,党中央就极为重视工会工作,恢复机构,制定方针,层层建立组织,发动工人、雇农、手工业工人入会,创办工人学校、出版工人刊物、发展边区工业、开展劳动竞赛和劳模运动、组织工人参与各种抗日的社会政治活动,领导和指挥国统区、沦陷区和解放区的工人运动,创造了在革命根据地、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开展工人运动的经验,为全国解放以后迅速开展的工会工作从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干部培养到广泛实践积累了经验,有多少工运干部为此付出了心血,有的甚至献出了生命。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边区各级工会干部积极带领边区工人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创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陕甘宁边区的党史和中国工运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一)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全总西北执行局)承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局的职能。

1935年11月成立的全总西北执行局的领导人员几乎是苏区中央执行局的全部“班底”。其中,刘少奇、邓振询、刘群仙三位同志在江西苏区就负责工会工作。管瑞才、蔡乾、朱学辉三位同志也是长征过来的,只有组织部部长高长久同志是陕北人,他同时兼陕西省总工会的委员长。这就从组织上保证了工作承接的连续性。

从1935年年底开始,无论全总西北执行局,还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对外发出的声音,都是以全总的名义或者代表了中华全国总会。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以后,西北执行局随即在瓦窑堡发出《中华全国总工会为声援北平学生运动告全国工友书》,号召全国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声援学生,反对压迫。

抗战爆发后,1937年12月9日,《陕

甘宁边区总工会致全国工友书》号召“工友们!我们应该要求南京政府立即给予全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以救亡抗战的自由与民主权力。”“同时,我们全国工人应立即行动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参加前线和后方的抗战工作;在华北,在松沪,在各战区组织义勇军,游击队,帮助军队作战。”“以工人阶级的英勇参战行为来做全国人民的模范。”

1937年12月31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发出《为召开陕甘宁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致全国各地工运同志及全国工友书》,写道:“中国工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的工人是中国工人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是全国工会、工人救亡团体的一部分。”“我们更欢迎全国工人、各地工人团体派代表或组织参观团前来延安参加我们的代表大会,帮助代表大会进行工作。”“我们期待着你们亲密热烈的回声。”

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开幕式,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富春发表演讲,他说:“边区工人过去在全国总工会领导下进行工作,全国总工会是在大革命时代组织的,所以边区工人是大革命的遗产及传统的保留者。”因为当时正是国共第二次合作,有些是不能讲透的,这些讲话,清楚地表达了一种传承关系。

(二)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的重要会议和活动,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从规模、规模、声势到会议作出的决议,都具有全国意义。

1938年4月17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召开。有正式代表近二百人,有全国各地工人团体及边区机关、团体来宾三百人;蒋介石、毛泽东、康生、朱学范、项英、刘少奇、陈云、张闻天等人为名誉主席团;大会收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从石家庄送来的贺电,电文写道:“我们已经占领了河北省的石家庄,我们用这一抗战的新胜利来祝贺你们的大会成功!”大会通过了七个通电,分致:中国共产党中央、蒋委员长、全世界工人、全国工人抗敌总会、八路军全体将士、各战区司令、长官及将士;1938年4月20日,毛泽东接见全体代表并做重要讲话,题目是《团结、打日本》,号召“工人阶级必须在各种斗争情形下,团结知识分子和可能革命的一切人民,组织起广大的革命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救中国、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个讲话,指明了工人运动的总方向。

1943年11月和1945年1月,围绕大生产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召开两次表彰奖励英雄模范大会,毛泽东同志都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组织起来”和“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的号召,指出英雄模范人物的三大作用(带头、骨干和桥梁作用)。1943年,毛泽东同志为大生产运动题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陕甘宁边区总工会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改进生产质量,激发劳动热情,于

1941年3月颁发了《关于迎接“五一”生产大竞赛的各项办法》和《奖励模范劳动者办法》,并且成立了竞赛评判委员会,委员中有朱德、李富春、邓发、林伯渠等,由此可以看出党中央对边区总工会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三)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和边区工人阶级为支援红军、支援抗战、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巨大贡献,作用无可替代,功绩不可磨灭。

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后,正值隆冬季节,红军战士和干部都穿着薄不禁风的破单衣。工会就发动工人和妇女,组织缝纫队,赶制棉衣、棉鞋,不到一个月,使红军战士全部穿上了棉衣棉鞋;1936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提出在三个月内完成扩大四干红军的计划,陕西省总工会筹委会积极响应,提出动员600名工人参加红军的任务,派出干部深入各县区做群众工作,迅速掀起工人参加红军的高潮,胜利完成了扩红任务。

1935年11月,刘少奇同志在第二次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上提出在边区成立黄河水手工会的任务。陕西省总工会立即向各县工会发出通知,要求摸清黄河水手数目和组织状况。不久,在瓦窑堡召开黄河水手工人代表大会,宣告成立黄河水手工会委员会。当时黄河水手工会有五六百人。这些黄河水手工人组织起来以后,配合河防部队巡逻沿河岸线,打造船只,1936年2月至4月工农红军东征过程中,英勇的黄河水手工人用简陋的木船、羊皮筏子,在短短的时间内,把两万多名红军安全运抵黄河东岸,胜利回师时,四百多名黄河水手不停地摆渡七天七夜,又把他们接回根据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黄河水手工人及游击队,一直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1947年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8月12日,边区总工会派人到黄河沿岸组织黄河水手工人,把后方机关、学校和伤员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转移到河东区,七百多华里的黄河沿岸,七百多名水手工人不分昼夜转运人员和物资,水手工人冒着弹雨划船,张候本、王区回光荣牺牲。为此,毛泽东同志亲自接见了桃花渡的水手工人,并同他们照相留念。

抗日战争爆发后,边区工人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建设边区、支援抗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国共内战期间,边区工人一手拿工具,一手拿枪,增加生产,组织工人游击队参军参战、运输物资,供应军需给养,缝制军鞋,拥军优属,付出了巨大牺牲。

(四)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在解放区民主政权下的丰富实践,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建国后的工作开辟了先河,创造了模式,探索了道路,积累了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工作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基本上是随着党的中心和边区的环境实际变化而转移的。例如: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总工会第二次执委会议,明确提出目前抗战动员中,中心工作是“努力生产,加紧学习”;1940年4月第三次执委会议,提出工会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在发扬民主、深入下层的原则下,巩固与扩大组织,加强阶级与民族教育,保护工人利益,并以全力来加强抗战动员工作,以巩固和保卫边区”,还明确提出

“组织、教育、保护工人的利益,是工会工作中有机的三位一体”。以后的历次执委会议,都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会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特点十分明显,“组织、教育、保护”任务的提出,应该是我们党最早对中国工会职能的明确表述。

延安时期,边区政府和工人有了自己的工业,自己的工厂,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得到了确立。1942年1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指出:“一个工厂内,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和职工会工作,必须统一于一个目标之下,这个共同目标,就是以尽可能节省的成本(原料工具及其他开支),制造尽可能多和尽可能好的产品。并在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下推销出去。这个成本少、产品好、推销快的任务是行政、支部、工会三方面三位一体的共同任务。”这个报告,明确了根据地工会工作的方向,从原则上解决了在革命政权下面,公营企业中党委、行政与工会之间的关系问题。1943年3月1日至4月2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直属各公营工厂会议,贯彻边区高级干部会议精神,会议决定在边区公营工厂中实行“工厂管理一元化”,即在工厂内部,厂长代表政府、集中管理工厂一切。会议决定:公营工厂党支部与职工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任务是“同工厂行政取得一致合作来完成生产任务”。

边区工厂和工会工作规范化、法制化建设初具雏形。1940年11月1日,陕甘宁边区总工会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总工会战时工厂集体合同条例》(共7章48条),对公营工厂工人工作的时间、假期、工资、休假、学习、待遇等都作出了详细规定,与此同时,边区政府颁布了《调节劳资关系办法》,主要应用于边区民营工厂,用工资谈判的方式,保护各方利益。

延安时期的劳模运动,是中国劳模评选的开端,延安是中国劳模运动的发祥地,“劳模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边区总工会动员职工开展的“赵占魁运动”和“增产立功运动”,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夺取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历次开展的“劳动模范”



↑1943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

“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等各种评选活动,强调和突出的仍然是他们的三大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和“桥梁作用”。

(五)陕甘宁边区创办了延安工人学校,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工会干部和人才,支援了全国。

1935年12月在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就提出“必须大量地培养干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抗战爆发以后,党中央和边区先后创办了二三十所干部学校,培养了数十万革命干部。1939年初创办的延安工人学校就是党中央领导下专门培养工会干部的学校,它先后培养了数千名工会干部。1945年抗战胜利前后,边区一次向东北派出两万多名干部,其中有一批工会干部和工人中的中坚力量,被派往新的解放区工作;解放前夕,又有一大批革命的精英被派往西南、西北。也有一些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工人运动的领袖永远长眠在革命圣地延安。

邓发同志于1940年2月9日在延安纪念“二七”大会的报告中说:“中国共产党开始是从职工运动起家立业的,中共与职工运动是心血相关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延安时期党的历史的研究十分深入,成果丰硕;延安时期党的工运历史同样丰富,然而挖掘、整理、研究得不够充分。这是中国工运史和中国工会历史研究的一个缺憾。延安乃至陕西的工会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此尽心尽力,认真学习探索和研究。 □ 李五明